

沧桑百年新江桥

仇柏年

仇柏年，省业余文保员。因考辨宁波旧影对本地历史发生兴趣，尤其关注江北岸外滩的演变，对浙海关、英国领事馆、天主教堂、邮政局、通商银行、英商洋行、朱宅等近代建筑的建造时间、变迁、用途等问题有一些新的发现。发表过《新江桥建造时间、地点及建造人考》、《老照片告诉我们》、《几张被误读的旧影》等文章。已完成《外滩烟云》书稿及《巡捕出现时间及巡捕房地址考》、《英商洋行“身世”初探》文稿。

一百五十多年前，在江夏街与江北岸之间往来，只能依靠摆渡过江。渡是座古渡，名叫桃花渡。“桃花渡口夜潮生，歌馆曾闻度曲声。满目蒿莱人不见，隔江惟有野狐鸣。”^[1]“载得扁舟江上行，雨余日嫩半阴晴。片帆直下桃花渡，春色三分昨夜生。”^[2]那个时候，永丰门外还不曾有渡，和义门外的渡口设置不久，而东渡门外的桃花渡，宋元明清的骚人墨客，已为它留下了不少诗作。

诞生 桥板之间能看到汹涌的江水

当历史翻到1863年这一页，一座由十八艘木船联结而成的浮桥，出现在桃花渡上游不远处的关帝道头，次年冬季又移到桃花渡。自此，即使是“两岸桃花春水涨”，也“不愁渡口满江风”了^[3]。虽说是浮桥，桥板之间空隙中能看到汹涌的江水，遇到风浪，桥还会上下起伏、左右摇摆，胆小的人走到桥上，难免战战兢兢，但相比那摆渡小船，毕竟是方便安全多了。

宁波建浮桥的历史十分久远，早在唐长庆三年(823)，就建成了连舟十六艘的东津浮桥，因竣工时恰逢天现彩虹，故名灵见桥，后称灵桥。灵桥是当时宁波三江之上唯一的桥梁，普通百姓也就称它为江桥、浮桥。新江桥的出现，灵桥自然就被称作老江桥、老浮桥了。

新江桥比老江桥年轻1040岁，它在此时问世，有其必然性，也带了点偶然性。说必然，是因为新江桥的南岸，是号称“走遍天下，不及宁波江夏”的江夏。这风水宝地，岸上市肆栉比，江边榭榭林立，各方商贾云集，市面早已十分

繁华。再加上此地位于东渡门外，人流密集，摩肩接踵；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而新江桥的北岸，是开埠已有十八年的外滩。此时江北岸发展的重心，已由槐树路桃渡路的姚江沿岸，开始向甬江沿岸的外滩转移。外滩日趋繁华，两岸的交通，依靠小舢板摆渡已不敷于事，建桥是必须的事。说偶然，是因为新江桥开建前一年，太平军攻占了宁波，官绅富豪纷纷躲入后来被称之为外人居留地的江北岸，很多老百姓为避战火也逃到这相对安全的地方。战争结束后，一部分人在江北岸留了下来，使南北两岸交通更加繁忙。有人看到“商机”，就筹划建桥。也许是这太平军的战火，“催生”了新江桥。

关于新江桥的建成时间、建造地点和建造人，《宁波市志》、《鄞县通志》、《雁湖志略》以及《光绪鄞县志》稿本和刻本，各有不同说法，归纳一下，建成时间上有同治元年、二年、三年及同治年间之说；建桥地点有江北岸关帝殿道头、盐仓门关帝殿道头之说；建造人有西人、英

商、费纶志李世濂等之说，或避而不说，或以管理人代之。综合各方面因素，笔者的看法是：新江桥始建于1862年，建成于1863年，迁建于1864年；始建时桥位应在今新江桥西侧一二百米处；由费纶志李世濂等宁波人与洋人合股兴建^[4]。

新江桥建成后由洋人把守，要付四枚铜钱才能过桥，肩贩者倍之，乘舆者更倍之。出资建桥、过桥收费，在西方社会或许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但在当时宁波，却难以被接受，因为自古以来，宁波人一直将修桥、铺路、造凉亭作为善举义举来做，最典型的如后来陈馨裁造十桥十亭，都是义桥义亭。过桥要交钱在宁波是破天荒的事，老百姓心目中，这无异于山大王收“卖路钱”。这种与传统道德相悖的做法，自然为当时社会舆论唾弃，这或许正是志书在建造人上闪烁其辞的原因。

运营 磕磕碰碰磨难不断

过桥费由洋人出面收取，目的是为了避税钱起衅，但实际上还是纠纷时起，争端不断。同治八年(1869)因过桥收费发生大惨案：宁波有行四月半庙会，迎五都元帅习俗。这一年行会热闹异常，其中彤云社最为出彩，“光怪为诸社冠”。当彤云社的队伍自城区游行过来时，江北岸观会者纷纷涌向新江桥，桥上观者如堵，洋人台佛生、恩多利等人，仍“上前按人纳税，少迟即逞其残暴，鞭拆齐施，于是会自东来，人向北窜，势如潮涌，桥梁遂折，坠水死者百余人，号呼痛哭之声震动天地。”^[5]因此，宁波有了“好看彤云社，翻落江桥下，余到下巴沙，撩(捞)起豆腐渣”的民谣。

惨案发生后，宁波地方人士多次想筹款赎回新江桥，使之成为不收过桥费的义桥。“五月初，周廷桂禀称集款赎桥，免行人税，西人故索巨价，款难筹集，事遂不果，此后禀请者多人，未成。”^[6]到了光绪初年，又因过桥收费发生命案，有营兵丁某董某过桥，因董某未穿号衣(一说穿在衣服内)，引起争执，被守桥人毆死(一说是被英人恩多利蹴死)。

邑绅陈政钥听说此事，深为悲愤，于是与姜伦棣等人一起与洋药商严文周协商，以在两年半内“出卖洋药时每箱加厘金三钱”的条件，由福建、宁波两帮洋药商筹银16000两，赎回新江桥。

陈政钥即鱼门太守，甬上传奇人物。赎桥时陈鱼门年逾六旬，睿智依然。新江桥照明有一矛盾：不点灯，行人有失足之虞；若点灯，船夫有撞船之患。因为点灯后，桥板下面“灯下黑”，船夫对着光，不易辨清桥洞。陈鱼门想出一法：“用四方式样之灯，中点火油灯六盏，东

西两面用洋铁，南北两面用玻璃，是以江中无影，而桥上有光”^[7]，船夫、行人，两全其美。新江桥修妥后，陈鱼门邀请本乡耆老祭桥，“主祭者为张君铁峰，年已八十九岁，足蹬红鞋，手扶鸠杖，须长尺许，及参神时乃易蟒袍补服朝珠，尚有绅耆多人亦皆须垂腹。是时观者填街塞巷，欢声雷动，以为从此后可得利涉矣”^[8]。让人遗憾的是新江桥赎回次年，陈鱼门溘然离世。

浮桥木制，要经常维修更新，开排、救生、防灾等也需要用人，因此每年要支出大量维修管理费用。光绪六年(1880)，邑绅江镜清、姜伦棣、陈祺沅等组织董事会善后，经与建宁洋药栈会商，议定自此年起，新江桥所需经费，由洋药栈立柱承办，建商分四柱、宁商分两柱，按月轮值。所需费用，由轮值之柱按月向众栈匀派给付。并订立八项条规，对组织人事、大修期限、轮值安排、以及禁烟罚则等都作了明确规定。然后禀请当道将相关内容刻入“新江桥永禁碑”，公示于世。

1906年，清朝诏定十年禁绝鸦片，洋药商日子渐渐不好过了，新江桥经理公所的收入也随之渐渐断了来源，入不敷出。严文周之子严康懋慷慨解囊，允诺不敷之款，俱由其垫补。1929年严去世后，不足资金又由周巽斋承担。1934年，周以年老力衰难胜重任请辞，经协商后，决定组织新江桥管理委员会，推选陈宝麟、俞济民、倪维熊、周巽斋、朱旭昌、毛秀生、俞佐宸等为委员，陈宝麟、俞济民为常委，轮流主持，分总务、工程、经济三组，缺口请平津会援助基金，向银行、轮船公司、同业公会等劝募。

建造和管理浮桥，在宁波已有一千多年历

史，营建技术已十分成熟，管理经验也相当丰富。1935年4月，温州永嘉商会拟在甬江建设浮桥，专此来函咨询，向宁波学习浮桥建造技术和管理方法。可见，宁波浮桥当时已名声在外。但这种依靠浮船承托的桥梁，具有先天缺陷。首先是抵御台风、洪水的能力很弱，遇到灾害天气，常常会发生桥断人亡惨祸。1881年6月26日《申报》报道：“宁郡于上月十九日昼间忽狂飙卷地，骤雨跳珠，新江桥上有三人连舟吹入江中，虽经救生船极力施救。奈其时水势湍急，打捞无踪。”1889年8月，一场暴风雨将新江桥、老江桥两座浮桥统统冲走。1912年12月，“北风怒吼，潮汛大涨。某树船进口由三江口抛锚，一时不慎顺潮退下，竟将新江桥第四排铁链撞断，江桥全排流开”^[9]。1922年9月，“新江桥因风潮大涨，铁索已断。幸经江桥工程局遣役二十余人预防，用粗绳缆住，并将桥板揭去，故未遭余去”^[10]。一百多年来，关于新江桥事故报道屡见不鲜。

浮桥再一个缺陷是桥上行人与桥下过船相矛盾，大船过桥必须开桥，即拆除桥面才能通过。每当开桥过船时，南北两端常常等满过桥行人，急于赶路的人仍得摆渡过江。后来新江桥只能限时开桥，规定“在清晨沪轮未到前开放，沪轮到后即须停止开放，下午二时至五时亦为停开江桥之期”^[11]，再后来干脆白天不再开桥，大船要等到夜晚才能通过。另外，新江桥桥面狭窄，通过能力很小，江北岸火车站建成通车后，新江桥更是不堪重负，每日当轮船夕开，火车既至之时，新江桥上车水马龙，人众杂沓，拥挤不堪，回旋无地。

